

闲逸与生态时代劳动伦理

——关于陶渊明回归诗学的再阐释

鲁枢元

在中国古代著名诗人中,像陶渊明这样长期生活在底层、亲自从事劳动生产的诗人的确不多。因此,“劳动”便成为当代陶渊明研究中的一个亮点,并被予以高度评价。

游国恩先生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中写道:“由于诗人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,并由衷地喜爱它,劳动,第一次在文人创造中得到充分的歌颂。他的一些田园诗还表现了只有一个劳动者才可能体会的思想感情……不仅表现了与剥削阶级寄生观点鲜明对立的依靠劳动生活的思想,而且表现了不辞辛苦、坚持躬耕的顽强态度。这些都超出一般士大夫的思想意识,使他的田园诗闪烁着进步的思想光辉。”^{〔1〕} 逯钦立先生在其《读陶管见》一文中,也极力强调陶渊明“长期的农耕劳动和斗争生活”的意义,认为这“使陶渊明逐步扬弃了封建教养,感染了农民的思想品质,一定程度地超越了阶级局限。他从坚持躬耕自资思想到要求人人劳动天下平等的思想,创作思想不断发展和提高”。为了突出“劳动”的意义,文章还有意把“退隐”与“躬耕”作出区别,认为“退隐”只是“躬

耕”的前提条件;“躬耕”才是陶渊明的最高价值与意义。因此,文章认真地告诫读者,不要过分地推崇那些歌颂隐居的诗篇,只有参加劳动一类的作品才是陶渊明的代表作,代表着他的特殊成就和最高成就。只有把握了这一点才能了解陶渊明及其写作的进步意义”。如果不这样看,那就将犯下“主观上推崇诗人,客观上贬抑了诗人的错误。”^{〔2〕} 廖仲安先生甚至还将陶渊明的劳动实践与儒家“固贫守节”的思想对立起来:“因为贫困生活的逼迫,他开始觉得孔子说的‘君子谋道不谋食’、‘忧道不忧贫’的话非常不切实际……于是不得不学起老农来了。”^{〔3〕}

把陶渊明的劳动实践推至登峰造极地步的,还应属李长之先生。他认为前期的陶渊明是一个“中小地主”,自己有房产,有童仆,属于剥削阶级。因此,“他在诗文中表现的封建地主的意识形态也就十分显著”,前期的许多诗篇中“都有俨然在人民头上而服服帖帖死心塌地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意味在。”^{〔4〕} 四十二岁以后,由于陶渊明越来越多地参加实际劳动,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不断靠近,与农民的距离不断

缩短 晚年愈是接近于一个农民的生活。“在中国的所有诗人中,像他这样体会劳动,在劳动中实践的人,还不容易找出第二人。因此,他终于是杰出的,伟大的了。”⁽⁴⁾为了突出“劳动”的伟大价值,李长之先生还把人们送给陶渊明的“闲适”、“淡远”、“孤洁”、“田园诗人”、“平民诗人”之类的头衔,统统看做是对陶渊明的“污蔑”⁽⁵⁾。

上述“劳动成就伟大诗人论”,在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中并不奇怪,当年甚至还曾有从工人、农民中大力选拔作家、诗人的政策。新时期以来,龚斌与袁行需关于陶渊明的专著中都不再纠缠于以往的“劳动说”,可谓开明之举。现在看来,“劳动创造文学”亦不妨当做众说纷纭中的一说。但是,无论从人类学还是社会学的意义上讲,“劳动”是一个事关重大而又异常复杂的问题,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活动,它与社会、自然、与人的精神生态的关系至为密切,至今存在诸多误区。陶渊明在“退隐”与“躬耕”、“劳作”与“闲逸”方面的践行与文学表现,或许会给我们某些启示。

“劳动光荣”、“劳工神圣”、“劳动创造了人”、“劳动创造世界”、“不劳动者不得食”这些提法固然不错,但也都是一定语境中的命题。换一种语境,劳动也可以是屈辱,劳工也可以很卑微,劳动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,也可以创造一个丑恶的世界,不从事劳动(只是别把一切都说是劳动)而单纯从事思考与写作的人也应当有饭吃;劳动创造了人也可以最终毁掉人。尤其在现代社会,“劳动”问题显得更为复杂,乃至接近于怪诞诡异。

马克思·韦伯认为,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,工业时代的“劳动”与农业时代的劳动有着本质的不同。农业时代的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是繁重的、苦累的,然而在劳动时间上则是松散的、灵活的、季节性的,在组织形式上是个体的、家庭型的,在种类上是多样的——你织布来我耕田、你挑水来我灌园。总之,是富于感性的、效益低下却相对自由的。而工业时代的劳动,由于机器的广泛使用且性能的不断提高,劳动者的体力支出大大减轻,但人被固定在机器上,个人被纳入庞大的劳动组织中,专业化程度高,劳动的时间被严格规定,精神处于高度紧张之中。韦伯将工业时代的这种劳动称作“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”,并把这种劳动方式看做资本主义的“起源问题”与“中心问题”。⁽⁶⁾

马克思强调工业时代的劳动是一种由资本、资

料、机器、设备、交通运输与劳动力“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”,资本主义社会的实体就是建立在这种性质的劳动之上的。⁽⁷⁾在对于这种劳动实质的看法上,韦伯与马克思大体一致,都认为那是一种“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”。只不过韦伯关注的是精神文化,马克思更关注的是政治经济领域的问题。

马克思指出,在这个劳动组合方式中,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,工人“只有自己的手和头”,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一无所有,而且还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由资本家支配。资本家为了高额利润将劳动者买进,劳动者为了谋生将自己卖出,劳动的剩余价值全被资本家拿去,成为他们继续增长的资本,工人们则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。在这样的社会里,劳动产品反而成了统治和奴役劳动者的异己力量;劳动失去人类本性中的自由,成为被逼迫、被强制的活动,劳动者不再能够从劳动中体会到幸福和愉悦。资本家最喜欢诚实、守纪律的劳动者,诚实、规矩的劳动者对劳动却充满愤怒与怨恨。这就是马克思命名的“劳动的异化”。马克思时常提起,在这个异化的劳动世界里,资本家比农奴主还要阴险狡猾,工人的处境比起当年的农奴还要悲惨!因此,马克思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:“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;消灭雇佣劳动制度!”⁽⁸⁾接下来便是持续一个多世纪的“四海翻腾云水怒,五洲震荡风雷激”的共产主义运动,遗憾的是,结果并没有落实马克思的设计。“昨日入城市,归来泪满襟”,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并不属于它们的建造者,为城市建设付出最多劳动的“农民工”却是地位最低下的人。勤劳很难致富,诸多富贵者不须勤劳;面对亿万“农民工”的遭遇,官员们、专家们任何关于“劳动光荣”、“劳工神圣”、“勤劳致富”的标榜,都显得过于空洞。

抛开劳动的阶级斗争学说,“劳动”其实还涉及另外一个重大课题,那就是“人与自然”的元问题。这一问题虽然无比重大,在以往的“劳动理论”或“劳动伦理”中却一直没有被认真地当做一个问题。

一些大型辞典中关于“劳动”的概念,一是基于黑格尔的观点:劳动是人利用工具支配外部自然的力量;一是凭借马克思的说法:劳动是人以自己的活动调整、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过程。由此得出的结论:劳动是“人类凭借工具改造自然物,使之适合自己的需要,同时改造人自身的有目的的活动”。“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而与自然物质相对立,有目的地以自身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自

然对象,在一种对人自己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。^{〔9〕}这一关于“劳动”概念的权威释义,其核心内容竟是:站在自然的对立面,从人的需要出发,改造自然,占有自然!如此看来,劳动既是人类为自己攫取财富的工具,又必然是对自然掠夺盘剥的利器。原来,人们是把资本家对待工人的立场态度置换到了人对自然的关系之中!资本家凭借一切手段控制、改造、占有他人是不公平的,是罪恶的,而人类这样对待自然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、合理合法的。面对严峻的地球生态危机,这样的“劳动法”、“劳动伦理”,也应当重新审视了!

目前,在那些所谓发达国家和高速发展的国家里,许多情况下劳动早已不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,而是为了满足现代人挥霍无度的消费欲望——那实际上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欲望沟壑。如今的许多规模盛大、组织严密的劳动——如砍伐森林、开挖大山、修高速公路、建拦江大坝、盖摩天大厦、造豪华汽车、开办超级市场、超级游乐场等等,其目的在于给人们提供冗余消费、奢侈消费,甚至仅仅出于官员晋升的举措和商家掘金的伎俩。结果,一是激发人们无度的贪欲,败坏了社会的道德;二是损耗巨量不可再生资源、破坏地球生态系统,最终毁坏人类自己的家园。这样的“劳动”,更多地是散发出种种腐恶之气,早已丧失了以往劳动观念中的道德芬芳。在这样的劳动观念支配下,世界上的贫富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,人类社会的安定和谐将更加遥遥无期。

这种畸形的劳动观,也必将严重地污染人们的心灵,损伤人的天性,即伤及人类的内在自然。睿智的波德里亚曾论及这一问题,在其《消费社会》一书中的最后一章,他由“消费”引申出另一个概念:“疲劳”。即现代人由于过度劳作、过度忙碌而引发的身心疲惫。他说:正像“消费”成为一个“世界性问题”一样,“疲劳”也正在成为一个“世界性问题”,成为“世纪新病症”,成为“我们时代的标志”^{〔10〕}。上帝似乎给现代人开了一个大玩笑,以身心享乐为目的、崇尚并实施着高消费的现代人群,却最终“透支”了自己,深深陷入极度的身心疲惫之中。而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提速,“付出”与“获得”之间的“赤字”越来越大。那就是说,现代消费文化逼迫消费者不能不付出与日俱增的巨大代价,而从中得到的“幸福”和“愉悦”却越来越少!其中的道理,其实又再简单不过: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(除去偶尔从福利彩票中赚得500万、5000万的幸运儿),一个人要想获得

更多的消费,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,永无休止的消费伴随着永无休止的劳作。

现代社会里的“休闲”也早已成为名目繁多的商品,并且是价格不菲的商品。君不见以往本是无价的清风、阳光、蓝天、星夜,现在也都被打入“农家乐”、“田园度假村”、“生态游览区”的成本核算中,呼吸一口清新空气,看一眼繁星密布的夜空,都要支付相当的费用。对于一般民众来说,享受休闲必须以更多的劳作为代价,最终以新的疲劳收场。波德里亚说:“疲劳”已经成为一种传染性的病症,已经成为“后工业社会的集体症候”。劳作与忙碌已经成为当代人脚上挣脱不掉的“舞鞋”。当代人已经深深地陷入“消费——劳作——消费——劳作……”的怪圈中不能自拔,宛如一个患上“强迫多动症”的精神病人。与精神病人不同的是,他不但在情不自禁地折磨着自己,同时还在肆无忌惮地糟蹋着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。

现在,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伟大诗人陶渊明,看他是如何过日子的。

陶渊明不像梭罗,家族中有自己的铅笔制造厂;也不像卢梭,可以替人抄乐谱、写书拿稿费。为了维持基本生存需要,他只有靠自己与家人的双手“土里刨食”,从事“夫耕于前,妻锄于后”的农业劳动:

“贫居依稼穡,戮力东南隅。不言春作苦,常恐贫所怀”;“衣食当须纪,力耕不吾欺”;“商歌非吾事,依依在耦耕”。^{〔11〕}

这种陇亩之上的劳作,有时还不得不起早摸黑、肩挑背扛,相当辛苦:

“晨出肆微勤,日入负禾还”;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。

但除此之外,陶渊明并没有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开拓发展的雄心;“弊庐何必广,取足蔽床席”;“耕织称其用,过此奚所须”;“营已良有极,过足非所钦”。因此,在乡土田园劳作之余,他仍可以“心有常闲”。空闲的时间,便用来读书,“既耕亦已种,时还读我书”。即便读书,也不是为了致用,“好读书,不求甚解”,更多地还是为了消闲。再不就是“得欢当作乐,斗酒聚比邻”。晨昏冷暖之际与街坊四邻把酒话桑麻,谈笑送日月;“父老杂乱言,觴酌失行次”,自有无限情趣在。除了这些,当然还有温馨和谐的家庭乐趣;“命室携童弱,良日登远游”,于秋高气爽之际,带

着老婆孩子,到山中远足,听闲谷鸣鸥,看云飞云散。孩子们虽然不求上进,上不了名牌,拿不到学位,但能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自在地活着,同样令人欣慰。不消说,在他日常生活中还有重要的一项,那就是诗歌创作,写下了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这样的诗行。

总之,陶渊明的生活中既有劳作之苦,也有闲逸之趣,这应该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种理想的有劳有逸、劳逸相得的“耕读”生活,唯独陶渊明能够做得臻于精纯。如若用现在生态批评的尺度衡量,这才是真正的“低碳生活”,一种“低物质消耗的高品位生活”。陶渊明的“杰出”、“伟大”,绝不仅仅在于他参加劳动、深入民众,而在于他真诚地践行了这一“劳动”与“闲逸”两相结合的生存方式,而且近乎完美地表达了这一生存方式。这或许就是海德格尔渴慕的那种生存方式:

充满劳绩,然而人诗意地
栖居在这片大地上。⁽¹²⁾

这种东方式的“劳动精神气质”,似乎天生是资本主义的“消解剂”。按照韦伯的说法,正是由于这种乐于悠闲、近于懒散的精神气质作梗,中国以及印度在自己的漫长社会进化史中,都没有能够从其内部生发出像样子的资本主义。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,恐怕还有待于今后人类历史演进的验证。

从全球生态安全考虑,现代人倒是不如少一些劳动,多一些懒散。

从现代社会公认的“劳动”理念看,卢梭、梭罗以及我们的陶渊明,这些堪称生态楷模的人物,看上去都是“懒散”的。梭罗活着的时候就被康克德镇上的公民看作一个“四处闲逛”、“游手好闲”、不务正业的人。他自己却一再表白,不愿意为了“消费的一时舒适”,去从事那些“诸多不适”的劳动,而在大自然中游游荡荡,不用花费一分钱,就可以得到人世中罕见的愉悦。⁽¹³⁾他还断定,现代人的“劳动”已经铸成“一个大错”⁽¹⁴⁾。卢梭在《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》中,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,钱多不一定快乐就多,“真正的快乐不能以金钱来衡量,用铜板得到的快乐比起用金币换来的快乐更亲切”。⁽¹⁵⁾

中国民间有句俗语“有书真富贵,无事小神仙”,说的也是闲适的可贵。欧阳修的《偶书》一诗,写到他晚年读陶的心得:“吾见陶靖节,爱酒又爱闲。二

者人所欲,不问愚与贤。奈何古今人,遂此乐犹难。饮酒或时有,得闲何鲜焉。”诗中充满了对“闲人”陶渊明的羡慕。苏东坡仕途坎坷,宦海沉浮,忙碌一生,颠簸一生,晚年从海南流放归来,方才彻底悟出生命的真谛,决计“对一张琴,一壶酒,一溪云,作个闲人”。当代老一辈学者钱谷融先生常自命“懒人”,又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“难得闲静斋”,还在文章中解释说:“有闲,方能有读书的时间,能静,方能有读书的心情……而我这几十年来所缺的,却就是这‘闲静’二字。唯‘闲’与‘静’,是我一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日夜向往、苦苦思求的东西。”⁽¹⁶⁾钱谷融先生把“闲静”看作自己、也看作“知识分子”安身立命的必要心境,是具有精神生态意义的。一个文化人唯求闲静而数十年来竟不可得,其中自渗透了难以言表的时代苦恼。如今中国,尽管不再有狂暴的整治知识分子的运动,然而较之前辈学人似更不得清闲。“哀莫大于心死”,与前代学者不同,他们缺少的是对于内心宁静的自我需求。发文章、上项目、拿奖励、评职称,进而当评委、当嘉宾、当老板、当股东、网上开博、签名售书、电视作秀,辛苦恣睢的结果是什么都有了,唯独没有了学问、道德。看来,“闲逸”、“闲静”不仅是个人心境,也与体制的属性、时代的氛围息息相关。

20世纪50年代,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,叫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:“咱们工人有力量,每天每日工作忙,发动了机器轰隆隆地响,举起了铁锤响叮当!盖起了高楼大厦,修起了铁路煤矿,改造得世界变了样!”当初作为一首工业支援战争前线的宣传歌曲,无可厚非,今天,作为一种“每天每日工作忙”的忘我劳动观,已不再被更年轻的一代人认同。21世纪,劳动观的变化已经悄悄发生在最底层的年轻打工者一族——“飞特族”。

“飞特族”(Freeter)是由英语free(自由)与德语arbeiter(工人)构成的一个混词,指那些没有固定单位,没有固定职业的年轻打工者。他们中的许多人甘居下游,缺少发家致富的欲望,缺乏向上奋斗的意志,对于他们来说休闲第一,适意第一,工作尚在其次。只在需要钱用的时候他们才去找一份工作,他们拒绝像其父兄辈那样遵守雇用制劳动道德、献身职场的生活方式,不愿看老板的脸色行事,也不怕丢掉工作,只希望用必要的一点劳动维持基本的生活。那不是富贵人家的生活,但那一定要是一种新鲜、随意、由自己独立掌控的自由生活。

他们被人戏称作“职场的吉普赛人”。

在这些人的心目中，“劳动”不再是人生的第一需要，也不再是改造世界的手段，更不再是“神圣的业绩”，生命的意义已开始朝着生命自身回归。

从年轻的“飞特族”身上，我们似乎又看到梭罗那懒散放纵、不务正业的身影，悟出卢梭所谓“愉快的生活是简单的，几乎随手可得，那不是富有，而是过不单调、不重复的生活”的哲理：也恍若看到陶渊明“今日天气佳，清吹与鸣弹”；“未知明日事，余襟良已殚”的洒脱；“耕织称其用，过此奚所需。去去百年外，身名同翳如”的散淡。无奈的是，“飞特儿”们向着生命本真的回归不能不遭遇到现代工业社会层层铁幕的阻隔，相对于农业时代的陶渊明，后现代的“回归自然”恍若一帘幽梦。陶渊明式的“南山”，在“飞特族”那里成了“网吧”，陶渊明式的“赋诗”成了“跟帖”，陶渊明式的“菊花”成了“动漫”；“种豆”成了“偷菜”，“酒壶”成了“微波炉”；“清吹鸣弹”成了“卡拉OK”。“飞特族”们是否最终“飞”得起来，还很难说。

但这毕竟是一个转折，一个跨时代的转折。

引人深思的是，这个叛离传统劳动伦理的“飞特族”，首先诞生在以“朝九晚九工作狂”、以高发“过劳死”著称的国度——日本。据日本官方统计，日本国内的“飞特族”已超过400万。日本“80后女性小说家”青山小蕙以“飞特族”为主要人物的小说《一个人的好天气》，因荣获2007年度芥川文学奖而风行世界，“飞特族”现象已成为现代职场社会一道异样的风景。

进入新世纪，此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后，读者数百万计，中国社会的“飞特族”也已在北京、上海、台北、广州、南京、深圳等大都市闪亮登场。即使不把他们

看作是陶渊明幽灵的灵光再现，起码也可以看作基于“自然”、“自由”的人类天性透过现代社会层层壁垒，在新一代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中萌生一片新绿，那也许就是“反者，道之动”的又一轮回，亦即《古乐府》中所吟唱的：“回黄转绿无定期，世事反复君所知”。

[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(03BZW007)的最终成果。]

注释：

(1)游国恩等主编《中国文学史》卷一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63年版，第243页。

(2)逯钦立：《逯钦立文存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版，第313页，第314页，第312页。

(3)廖仲安：《陶渊明》，国文天地出版公司(台北)，1992年版，第19页。

(4)(5)李长之：《陶渊明传论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版，第129页，第145页。

(6)[德]马克思·韦伯：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，三联书店，1987年版，第13页。

(7)(8)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16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64年版，第140页，第169页。

(9)冯契主编：《哲学大辞典》上卷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1年版，第790页。

(10)[法]波德里亚：《消费社会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0年版，第208页。

(11)陶渊明诗文均见袁行霈：《陶渊明集笺注》附录《陶渊明诗文句索引》，中华书局，2003年版。

(12)[德]海德格尔：《荷尔德林诗的阐释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02年版，第46页。

(13)(14)(15)[美]梭罗：《瓦尔登湖》，吉林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版，第48页，第3页，第146页。

(16)钱谷融：《散淡人生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0年版，第344页。

(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文学院/山东大学文学院)